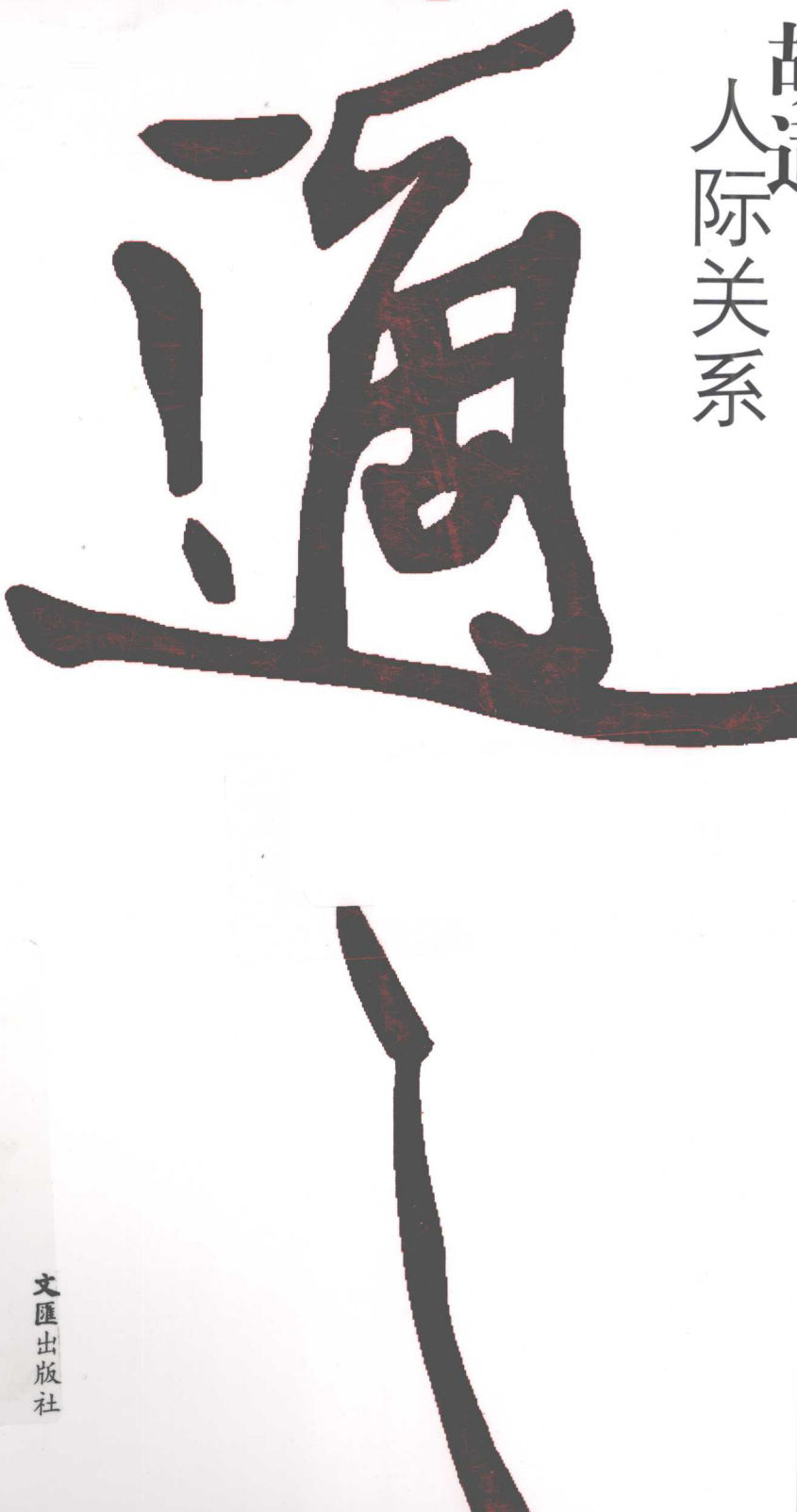


桑逢康·著

胡适 人际关系

朱经农 杨杏佛 许怡荪 赵元任 梅光迪 任鸿隼 陈衡哲 陈独秀 李大钊 鲁迅 周作人 钱玄同 刘半农 陶孟和 高一涵 蔡元培
 傅斯年 罗家伦 顾颉刚 俞平伯 梁漱溟 辜鸿铭 梁启超 章太炎 王国维 马君武 王云五 高梦旦 郭沫若 郁达夫 丁文江 徐志摩
 陈西滢 林语堂 闻一多 罗隆基 梁实秋 蒋梦麟 周炳琳 毛子水 钱穆 饶毓泰 吴大猷 江泽涵 罗常培 魏建功 罗尔纲 孙中山
 蒋介石 毛泽东 汪精卫 章士钊 吴稚晖 王世杰 朱家骅 陶希圣 张伯苓 梅贻琦 陈垣 陈寅恪 冯友兰 周鯨生 吴晗 孙中山
 陈雪屏 郑天挺 季羨林 邓广铭 千家驹 陈光甫 雷震 吴健雄 王重民 李济 唐德刚 胡颂平 李敖 韦莲司 江冬秀 曹佩英
 杜威 罗素 泰戈尔 司徒雷登 爱新觉罗·溥仪



文匯出版社

桑逢康·著

文匯出版社

胡适
人际关系

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适人际关系 / 桑逢康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741-774-3

I. ①胡... II. ①桑... III. ①胡适 (1891-1962) — 人间交往—研究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7579 号

胡适人际关系

作者 / 桑逢康

责任编辑 / 刘刚

特约编辑 / 黄亨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江苏常熟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640 × 960 1/16

字数 / 330 千

印张 / 30.5

书号 / ISBN 978-7-80741-774-3

定价 / 56.00 元

作者未能联系上的照片版权所有, 望见书后拨冗联络

序 言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我的朋友胡适之”，是过去不少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胡适一生的确有许多朋友，在社会上编织了一个相当广泛的关系网。交情有深有浅，友谊或长或短。有人终生为友，有人先合后分。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折射出了胡适的思想与品格，从胡适人际关系的演变中又可以看到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轨迹。一句话：胡适的人际关系网以文化教育学术界为中心，旁及政界、军界、商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相互关系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关系的缩影。从人际关系的视角考察胡适，是胡适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本书涉及到的与胡适关系密切的人物近百人，分门别类而又大致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叙述并加以评说。这近百个人物虽然不足以囊括胡适人际交往的全部，但却几乎代表了胡适人际关系的主要部分，也是胡适人际关系最本质的体现。

在写法上借鉴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不同的是各色人等都围绕一个中心人物即胡适展开，编入与胡适有关的部分，舍弃与胡适无关的部分。并且采用开放式的结构，每个人物各自成篇，根据材料的多少或增或减，开合自如而又不致影响全局。跨门类与跨越时间段的人物，则按其属于何种类别，以及何时与胡适交往较多或关系较为密切，列入较比适合的地方且不在另处存目。这在各章之前的提要中会有所说明。

而就众多的人物史料来说，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部工具书，既可供研究工作者参考，又适用于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扩大人文历史知识面。

本书主要依据44卷本《胡适全集》，并参考了其他一些相关材料。为忠于历史，向读者展示胡适人际关系的原貌，故而引文较多。为避免繁琐，除在行文中顺便提及外，其余绝大多数引文均不一一注明出处（包括书名、篇名、发表与出版时间、刊物与出版社等等）。特此说明。

桑逢康

2009年3月23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留美学友，中共同窗	1
朱经农 /5 杨杏佛 /12 许怡荪 /17 赵元任 /23	
梅光迪 /33 任鸿隽 /41 陈衡哲 /48	
第二章 《新青年》同仁	55
陈独秀 /57 钱玄同 /61 刘半农 /66 李大钊 /70	
鲁迅 /74 周作人 /79 陶孟和 /83 高一涵 /87	
第三章 北大人部落（早期）	93
蔡元培 /95 傅斯年 /102 罗家伦 /111 顾颉刚 /116	
俞平伯 /120 梁漱溟 /124 辜鸿铭 /129	
第四章 师之辈	135
梁启超 /137 章太炎 /141 王国维 /145 马君武 /148	
王云五 /152 高梦旦 /155	
第五章 道不同，不相为谋	163
郭沫若 /164 郁达夫 /173	
第六章 人以群分，星月闪耀	183
丁文江 /185 徐志摩 /191 陈西滢 /198 林语堂 /204	
梁实秋 /208 闻一多 /213 罗隆基 /218	

第七章	北大人部落（中期）	227
	蒋梦麟 /229 周柄琳 /235 钱穆 /240 毛子水 /242	
	饶毓泰 /246 吴大猷 /248 江泽涵 /251 罗常培 /254	
	魏建功 /257 罗尔纲 /259	
第八章	政界高端	267
	孙中山 /269 蒋介石 /273 毛泽东 /291	
	爱新觉罗·溥仪 /297 汪精卫 /301	
第九章	学界政界两栖友	309
	章士钊 /311 吴稚晖 /316 王世杰 /320 朱家骅 /325	
	陶希圣 /329	
第十章	友校友人	335
	张伯苓 /337 梅贻琦 /341 陈垣 /346 陈寅恪 /351	
	冯友兰 /354 周鲠生 /358 吴晗 /363	
第十一章	北大人部落（晚期）	369
	汤用彤 /370 陈雪屏 /373 郑天挺 /376 季羨林 /381	
	邓广铭 /385 千家驹 /389	
第十二章	故友新交在美、台	393
	陈光甫 /395 雷震 /401 吴健雄 /406 王重民 /412	
	李济 /416 唐德刚 /420 胡颂平 /425 李敖 /432	
第十三章	红颜知己，“小脚村姑”	437
	韦莲司 /441 江冬秀 /443 曹佩英 /450	
第十四章	外国友人	455
	杜威 /457 罗素 /464 泰戈尔 /467 司徒雷登 /471	

第一章

留美学友，中共同窗

朱经农 杨杏佛 许怡荪 赵元任 梅光迪 任鸿隽 陈衡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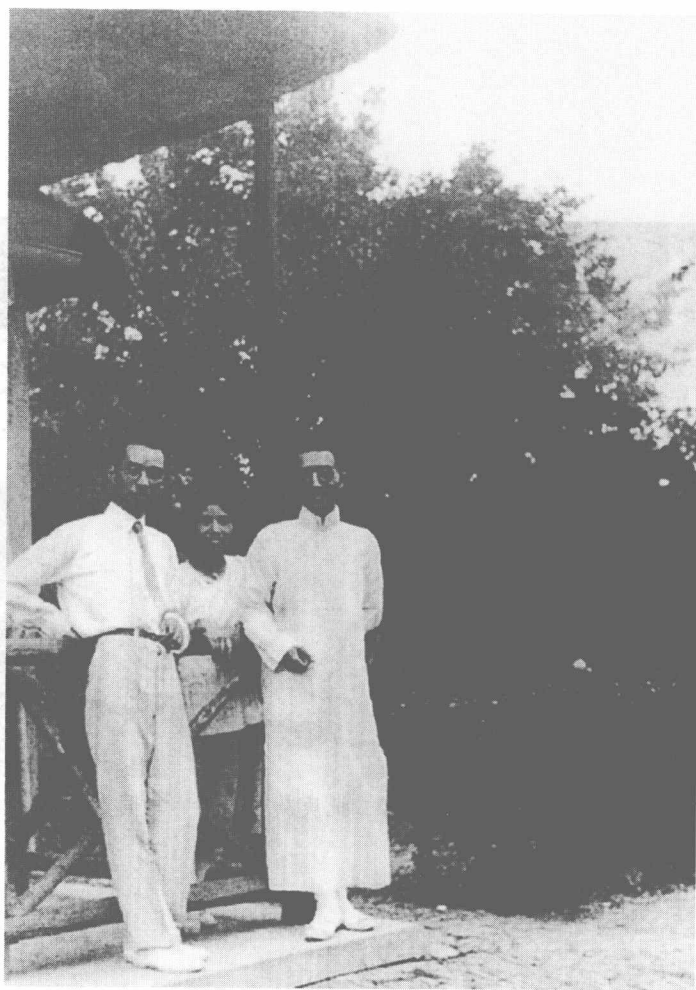
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上，一艘海轮自西向东迎着太阳破浪前行。船上有七十一名中国青年学子，个个欢欣雀跃，人人踌躇满志。他们是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官费生到美国去留学的，其中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叫胡适。

在此之前的1906—1909年，胡适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留美学友中有几位便是过去的中共同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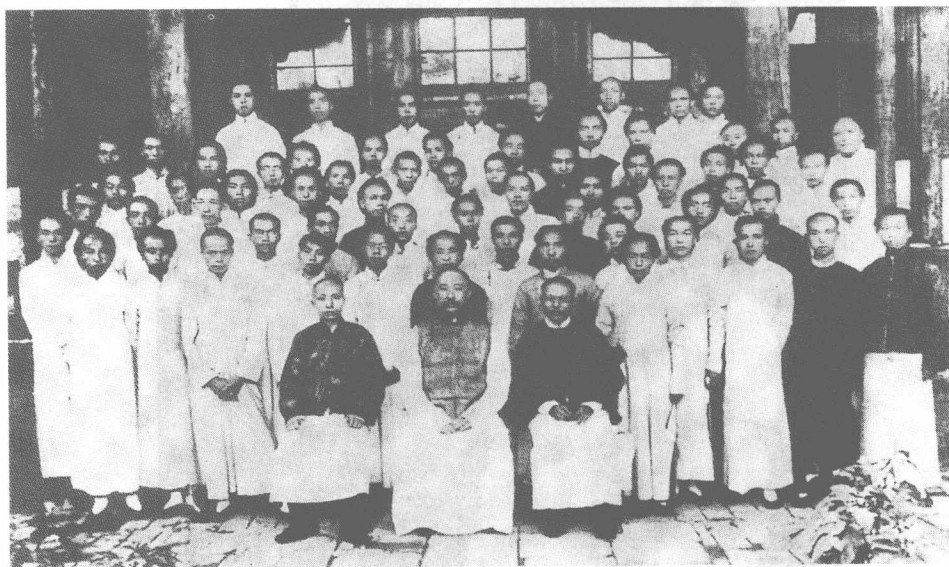
胡适在美国留学七年(1910—1917)。他在留学期间，接受了初步的美国式的政治训练，接受并形成了实验主义的哲学观，最有意义的是通过与一些学友的辩论，萌生并提出了文学改良的主张。



胡适与在台湾的中国公学校友合影。(摄于1954年)



胡适（右）、任鸿隽（左）、陈衡哲（中）1920年8月摄于南京。



1910年8月胡适（三排左一）考取第二批庚款官费后，与同期赴美留学的学子们合影。

朱经农

朱经农(1887 - 1951),生于浙江浦江。少年丧父,后随叔父迁居湖南。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考入常德府中学堂,次年赴日本进弘文学院、成城学院学习。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加入同盟会。是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包括朱经农在内的部分我留日学生愤而回国,在上海新靶子路黄板桥北创办中国公学,继续学业。

中国公学全校的组织分为“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教务干事、庶务干事、斋务干事)均用民主方式从学生中选出,朱经农为中国公学三干事之一。有几门功课如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博物学最初请的是日本教员,讲课时由朱经农等懂日语的同学翻译。

中国公学系民办学校,经费十分困难,作为干事的朱经农忧愁过度,以致神经错乱,有一天他走出校门,来到徐家汇一条小河边,竟跳下河去,幸亏被人救起。从这一件小事,便可看出他做事情是何等的执着,以至到了钻牛角尖的程度。

胡适1906年夏考入中国公学,和朱经农是同学。教员和学生中能作诗的人不少,胡适在学校里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学唱和,其中就有朱经农。后来胡适在回忆中公学习生活时说:“经农为中国公学之秀,与余甚相得,余庚戌《怀人诗》所谓‘海上朱家’者是也。”

辛亥革命后,朱经农应宋教仁和覃振的邀请,到北京任《民主报》、《亚东新闻》编辑。“二次革命”中遭袁世凯通缉。1916年由清华津贴赴美国人华盛顿大学就读。当时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设有学生监督处,朱经农来后兼任书记,负责留美学生的相关事务。

胡适早几年考取庚款官费生来美留学,此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他在日记中专门记有“喜朱经农来美”一条,说:“(辛亥)革命后,国中友人,音问多疏,独时时念及汤保民及经农二人,今闻其来,喜何可言?惜不能即相见耳。”

胡适这天的日记写于1916年6月9日,朱经农8月底即怀着同样渴望见面的心情,从华盛顿千里迢迢赶来看他。两个老朋友别后重逢,畅谈极欢,胡适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六年你我不相见，见时在赫贞江边；
握手一笑不须说，你我如今更少年。
回头你我年老时，粉条黑板作讲师；
更有暮气大可笑，喜作丧气颓唐诗。

……

年来意气更奇横，不消使酒称狂生。
头发偶有一茎白，年纪反觉十岁轻。
旧事三日说不全，且喜皇帝不姓袁，
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来江边。
赫贞江水平可怜。树下石上好作筵：
牛油面包颇新鲜，家乡茶叶不费钱。

他们谈往日在中公同学时的情景，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致声讨中死去；他们带着面包、茶水等物出游，在赫贞江边树下石上野餐，吃饱喝胀快活赛神仙……朱经农在胡适处整整逗留了三天。“三日之留，忽忽遂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朱经农走后胡适终日不欢，怅然若失。

在围绕“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的争论中，朱经农起初也和胡适的意见相左。他认为“白话诗无甚可取”、“盖白话诗即打油诗”，又说胡适的诗“谓之返古则可，谓之白话则不可”。胡适则“极反对返古之说”，他宁受“打油”之号，不欲居“返古”之名。

胡适在与留美学友的相互辩驳中，经过认真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新文学观，他概括为“文学革命八条件”，即“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 (一) 不用典。
- (二) 不用陈套语。
- (三) 不讲对仗。
- (四) 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 (五) 须讲求文法。
——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 (六) 不作无病之呻吟。
- (七) 不摹仿古人。

（八）须言之有物。

——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

这“八不主义”的新文学观，胡适在1916年8月19日写给朱经农的一封信中最早提了出来。10月寄书陈独秀重申“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又据此要点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于1917年1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同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1号上也登载了这篇文章。致陈独秀书和《文学改良刍议》中言及“八事”表述虽有所不同，前后顺序也有所调整，但均脱胎于8月19日胡适写给朱经农的那一封信。所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朱经农是胡适“八事”（或称“八不主义”）新文学观的第一位读者，第一位知悉者，要略早于陈独秀。

朱经农并不像梅光迪那样固执旧见，他对胡适的几首白话诗持赞许的态度，后来他自己也尝试用白话写诗：“日来作诗如写信，不打底稿不查韵。……颀庄若见此种诗，必然归咎胡适之。适之立下坏榜样，他人学之更不像。请看此种真白话，可否再将招牌挂？”这让胡适感到很高兴，说：

“余初作白话诗时，故人中如经农、叔永、颀庄皆极力反对。两月以来，余颇不事笔战，但作白话诗而已。意欲俟‘实地试验’之结果，定吾所主张之是非。今虽无大效可言，然《黄蝴蝶》、《尝试》、《他》、《赠经农》四首，皆能使经农、叔永、杏佛称许，则反对之力渐消矣。经农前日来书，不但不反对白话，且竟作白话之诗，欲再挂‘白话’招牌。吾之欢喜，何待言也！”

高兴之余，胡适回了朱经农一首：“寄来白话诗很好，读了欢喜不得了，要挂招牌怕还早。‘突然数语’吓倒我，‘兴至挥毫’已欠妥，‘书未催成’更不可。且等白话句句真，金字招牌簇簇新，大吹大打送上门。”

1917年5月胡适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随即于6月回国。朱经农自华盛顿远道来送别。胡适作《朋友篇》（即《将归之诗》）赠怡荪、经农，其中有“人生无好友，如身无足手”二句堪称是至理名言。

朱经农在美国实际上是半工半读，他在国内有七旬老母，所以经济上很是拮据。胡适有意召他回国执教，朱经农写信给胡适说：“清华津贴仅限一年，若毅然而去，则明年此日不但无费留学，且将无费归国矣，故不得不仍旧俯首作工，必俟生计问题稍有把握，然后去之。兄所赐之介绍片一张，敬谨收存，留待后用。”胡适得悉朱母生活困难，从自己薪津中拿出一部分予以接济，这让朱氏母

子甚为感动。朱母写信给经农说：“不料儿于此薄世中能得此等好朋友。”朱经农则对胡适言道，“兄诚为我之好朋友矣”，“我母亲每次来信都说你是我的第一个真朋友，这句话是真真不错的”，同时表示“弟万不欲以款事累兄，已去信令早日归还兄款。弟所望于兄者，但于暇时偶过舍间一坐，问问老人健否，则感戴无涯矣”。

胡适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又加入《新青年》编辑行列，声名鹊起，如日中天。朱经农在《新青年》上读到了胡适写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认为文章“所说很有道理。中国人有守旧的根性，并有一种坏习惯，就是无论何种不合时宜的东西，都要借几句西学门面话来搪塞欺人，如指脸谱为图案之类”。又说：“我对于白话文学现在甚为欢迎。但文字这样东西是mean（手段），不是end（目的）。”若专重文字，恐怕要陷入文艺复兴时代狭隘的人文主义教育的覆辙，“我们最重要的事体是替中国造成一种Spirit of nationality（民族主义精神）”。他提醒胡适：“我们既要用白话文字造成一种国魂，便要使白话文字受多数人的欢迎。要使白话文字受多数人的欢迎，先要求减少障碍。有些无味的笔墨官司少打些为是，留着精神做 Construction work（建设工作）罢。”

那时在学校里、社会上，在众多人的心目中，胡适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大家都尊称他“胡适博士”。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封面上也赫然印了一行字：“胡适博士著”。然而也有人对胡适的“博士”头衔提出了质疑：胡适只是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考试，并未正式拿到博士文凭。一时间胡适是真博士还是假博士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胡适本人并没有怎么在意，在美国的朱经农倒为他着急起来了，两次致信胡适要他设法自卫：

“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讎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说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设法‘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1919年9月7日）

“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1920年8月9日）

美国大学有一项规定：参加博士论文考试的每位博士候选人，要向学校当局提供论文副本100份。胡适因忙于回国，没有提供论文副本，所以手续不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记录上只是博士候选人，离正式的博士学位还差一大截。别人对他的“博士”头衔提出置疑不是毫无道理的，朱经农一再催促他把论文赶紧印出，也正是为朋友着想，“亡羊补牢，时犹未晚”。1927年胡适再度去美国纽约时，才正式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比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整整迟了十年之久。

胡适和朱经农有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怀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与热忱。胡适将“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曾经说过：“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专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朱经农对教育也有很浓厚的兴味，他认为“救国的第一着全在教育”，主张“应当集合全国的智能（Concentraion of all intellectual forces），一方面与萎靡不振的旧习惯挑战，一方面替‘万花齐放’的新气象立个稳固的基础。”否则，“高谈改革改制，不从国民智识方面入手，也不过如无源之水，无根之草，昙花一现，没有实际利益的”。

先期回国的胡适，有意召朱经农回国在北大任教。朱经农虽然获得了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但他觉得自己的学问尚不足以充当大学教授，所以1920年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继续深造。之所以专攻师范，自然是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抱负。

本着这种信念，朱经农于1921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他发表了多篇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23年朱经农应王云五之邀赴上海，为商务印书馆主编中小学教科书。他还和朱其慧、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与陶行知合编《平民千字课本》。胡适将小说《差不多先生传》寄给朱经农，由朱经农在《平民周刊》第一期上发表后，传诵一时。作为答谢，朱经农特意让《平民周刊》购买了一本日人渡边秀方近著《支那哲学史概论》送与胡适，供其讲授和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参考。

清末维新变法以后设立的新式学堂，在学制上各地很不统一，部分学校仿效

日本的学制。1921年在广州召开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学制改订并草拟新学制方案。胡适在《新教育》4卷2期上发表文章，谈了他对于新学制的一些感想，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和有关人士的重视。1922年9月25日至30日，胡适作为新学制的起草人之一，出席了教育部召集的学制会议。紧接着，10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由教育部提出的学制草案引发了诸多争议。

朱经农因为在商务印书馆编中小学教科书，无暇与会，但他和王云五先生对学程编制问题都有许多意见。朱经农特地写信给胡适说：“改革学制，非改革学程不可，这回山东开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要紧的事体就是讨论中小学校课程的标准。若不把课程的分量和时间的配置大致规定出来，闹了两年的新学制，真是一点实用没有。”他的意见提供给了胡适作一些提案的材料。

胡适在这次会议上被推为新学制草案的主要起草员，他归纳并折衷广州议案和教育部草案，参照英美学制，连夜拟定了一个综合方案，经会议作了某些修正，最后获得通过。从这一年起，中国改订新学制，将小学七年制改为六年制，中学四年制改为六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而把大学预科取消。大学本科仍为四年，毕业后再进研究院。可能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朱经农对新学制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说：“我们编教科书的人，拿着这样一个‘囫囵吞枣’的学制真是没有办法。”

1925年8月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并强行武装“接收”，引起女师大学生的强烈反对。为支援女师大，北京大学评议会以7票对6票通过决议，宣布北大独立，与北洋政府脱离关系。作为北大评议会的成员，胡适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因而招致其他一些教授、教员以及青年学生的不满。不过朱经农却持赞成的态度，他写信对胡适说：“你们这一次出来反对评议会，我极以为然，所以写一封信向你们表同情。北京教育界如果像这样下去，中国学术界要永远沉沦了。有胆识的人应该出来自树旗帜。”

在朱经农眼里，胡适有胆有识，是教育界的一面旗帜。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动员胡适去出席联大太平洋国民会议，“今年会议我们希望另外找几位出色代表，希望你能够出去走一遭，替国家争争面子”。

朱经农的胞兄朱我农，留学英国，娶了一位英国女人做妻子。因为胡适和朱经农有深交，故而朱我农同胡适也亲如兄弟。

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三位中方委员之一，另两位是丁文江、王景春。1926年3月三位英方委员来华，与中方委员一起在上海开会，研究款项使用分配

事宜。我国教育界人士对庚款问题十分关注，时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的朱我农致函胡适提出：

（一）英国应明白宣布退还庚款。

（二）保管及支配权须由中国人自己掌握。

他十分动情而又严肃地说：“……弟与兄亲近如兄弟，弟所期望于兄者，至大且巨，望兄勿以弟言为泛泛者。英款一事，全国智识阶级皆十分注意，务望兄十分精细，十分坚定，以代表多数意见为最要责任，勿有一丝一毫之疏忽，勿为一、二人之见解所蔽，至盼至祷。”

全国教育联合会等团体代表也致函胡适等中方委员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希望他们“遵从公意，保卫国权”，签名者中有朱我农。

更有意思的是，朱我农在致胡适信中特别提示说：“兆熙兄之得加入委员会，系另有作用者，弟亲闻叶玉虎言之。弟与兄至交，不敢不以告，望注意。此纸阅后，请付火，因王与弟亦有交谊，不愿伊知弟有此言，此言非兄，弟也不敢告也。”兆熙即王景春，朱我农与他也有交情，但远远不如与胡适的交情深厚。他和胡适是“至交”，“亲如兄弟”。

朱我农1930年底病逝，临危时胡适曾去医院探视，并到朱家慰问我农、经农年迈的母亲。他在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经农没有信来，傍晚我到我农家，始知我农今早七点死了。见到他八十岁老母，不胜感伤。”胡适对朱我农是很了解的，他说：“我农天资极聪明，少年时不谨慎，在英国时尤多过失，几至犯罪。但十余年来，总算能改过，而往年的恶名终为一生之累，少年所学又无根柢，只能混饭吃，而不能有所成立。家累又重，一个英国妻子，三个孩子，一个老母。近年教书至卅余点钟，劳瘁而死，可怜。”

和早逝的朱我农不同，胡适在教育工作岗位上有着辉煌的经历，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校长，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公学校长。有人称颂胡适是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朱经农同样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1923年担任过光华大学教务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大学院普教处长、教育部普教司长、教育部代理常务次长、专任常务次长。1931年担任中国公学副校长。1932年至1943年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在推行小学义务教育，增设中、小学和创办大专院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43年起历任中央大学教育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光华大学校长等职。集多年办学之经验，朱经农深知，“中国的政客，看见教育界有一种潜势力，所以都想来操纵教